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社会语言学研究： 文化·色彩·思维篇

杨永林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研究

理论·历史·应用

周小波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H0/71

2004

中国外语知名学者文库

社会语言学研究：

文化·色彩·思维篇

杨永林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语言学研究 / 杨永林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2 (2006 重印)
(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7-04-013757-7

I. 社… II. 杨…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063 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责任编辑 梁 宇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孙 伟 责任校对 梁 宇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4.25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字 数	350 000	定 价	26.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3757-00

序 言

桂诗春

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的姐妹篇，杨永林教授又呈献另一佳作《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色彩·思维篇》，嘱我做序，欣然应命。

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着深厚的联系，而一个国家的悠久历史正是这种联系的见证。我国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以统一大业，西汉杨雄做《方言》，以记录汉语词汇在地理上的差异。从清末开始的汉字改革和1919年“五四”白话文运动，既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语言学存在与发展的范例。在西方，19世纪末的方言地理学和20世纪初的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①也在考察语言和社会、民俗、文化、地域的关系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这些姐妹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研究目标和领域，但却对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的60年代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起了催生作用。

我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几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当时看到的第一本书是Halliday等三人所写的*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1964)，这本书以语言教学作为出发点，谈到了一些新兴语言学科对改进语言教学的一些启发。Halliday本人是一位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书中谈到不少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振聋发聩，惹人深思。几年后，我有机会赴英作短期学术访问。到过英国一间综合中学（即有别于私立的贵族公学的普通中学）去听了一堂高中毕业班的英语课。教师上课先放几段录音，其中有丘吉尔二战时期的一段炉边谈话、一段牧师的布道文、一段家庭妇女逛市场的谈话、一段女售货员在柜台边上的讲话。然后让学生根据说话内容来判断说话人的身份、职业、文化水平和地区。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根据说话的语言特点来进行讨论，热烈而生动。有根据谈话的内容者，有根据所用的语体者，有根据说话人的方音者，最后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时我感到很新鲜，向授课老师刨根问底，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毕业班的英国学生上英语课应该都是学校高深的英国文学作品，不会再学母语的使用。他送了一本详尽的教学大纲，我一看，书名为*Language in Use*，而主编就是Halliday。事隔30多年后，我于去年又在广州见到他，承

① 在社会语言学中，有所谓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译作“民族语言交际学”。按照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College Edition, 1957)的定义，ethnography为the branch of anthropology that deals descriptively with specific cultures, especially those of primitive peoples or groups。“民族语言交际学”缺少了“文化”的内涵，可否索性把它译成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语言学”？

他告诉我编写教学大纲的背景：当时英国政府有鉴于应用语言学的进展，成立一个包括语言学家和中学教师在内的规划小组，以他为首，专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对改革母语教学的启发，教学大纲便是大家研究的成果，并付之实行。我想这和上面提到的那本专著不无关系。

但是就我而言，经过这些初步接触后，却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社会语言学上面，因为我觉得研究社会语言学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去开垦像美国语言学家Nida所说的中国这片社会语言学的处女地，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过我始终是关注着这块热土，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去耕耘，因为有些学术问题（如语言和思维）是共通的，不同学科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去考察问题而已。

杨永林教授正是在社会语言学的这片热土上辛勤劳作的垦荒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人使用颜色词的社会性差异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成果。经过15年来的努力，他坚持自己所提出的“宏观控制，选准热点，知难而进，谈深谈透”的研究方针，在语言功能、文化、思维、称谓、性别、颜色等方面开展了原创性的研究，荦荦大端，使人目不暇接。这说明社会语言学在我国已经从单纯的介绍和引进走上了吸收和发展的康庄大道。而这一本集子更是侧重在讨论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都是近年来国人感兴趣的、可以上升到哲学高度的问题。相信读者必会从中获益。

更值得指出的是，杨永林教授的这些研究不限于就事论事的描述，而立足于理论概括。他在前言里提出了所要恪守的五项原则：解码性、分析性、透彻性、重构性、概括性，并且做了穷源溯流、醍醐灌顶的阐述，作为其讨论问题和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我觉得这种从方法论的高度去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做法甚为可取，因为它使人在惊叹作者所取得的令人艳羡的成果之余，也能按图索骥，有所遵循。

再回到我开始所引用的 Halliday 那一本书。它告诉我们社会语言学对语言教学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我国的语文教学往往是“重文轻语”，究其原因还是语文改革未能吸收语言研究的新成果。我们热切地希望杨教授继续开展他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继续向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进军，再写一本集子。

是为序。

2004年春 于白云山下

前言

时光如箭，岁月如梭。从我在 *Sociolinguistics* 上发表第一篇社会语言学论文以来(Yang 1988)，迄今已有 15 年的光景了。但是，文章刊发前后的许多琐碎细节，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15 年学术生涯，如白驹过隙，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事。联想起自己学质浅陋，学业又无太大建树，空对岁月，白掷时光，怎不叫人汗颜？仔细一想，这种看法又有偏颇：回顾 15 年的炎暑寒冬，雨夜晴昼，窃以为工作学习，用力甚勤，不敢枉做半日闲。这些年来，就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说，虽然不敢言已达通识，但也不宜妄自菲薄，一味自谦而缺少诚意。但凡一种学问，不管难易程度如何，只要方法对头，持之以恒，辛勤耕耘，自然有所收获的，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经过数年劳作，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这片沃土上，自己多少也积累了一点教学科研心得体会，愿意总结成册，就教方家，并飧同好——这是引发撰写这本专著的内在原因。近些年来，又蒙师长关怀，同辈督促，后学企盼，嘱我早日成书，形成系统之说——这是加速完成此书撰写的外在动力。《社会语言学研究：功能·称谓·性别篇》(以下简称为《功能·称谓·性别篇》，杨永林 2004)成书之后，静下心来，细细梳理，发现社会语言学的许多问题，倘要仔细研究，不免有“拔起萝卜带起泥”的感觉。通过深入思考，反复揣摩，逐步形成了“宏观控制，选准热点，知难而进，谈深谈透”的研究方针——这是最终形成“自成系列，动态发展，不断深化”编写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依据这一编写理念，继《功能·称谓·性别篇》之后，现在又完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色彩·思维篇》(以下简称为《文化·色彩·思维篇》)的撰写。作为系列研究，这两本专著的刊行，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后还会逐步推出其他相关研究，愿读者与我们共勉。

本项研究采用“学科名称”+“主题内容”作为书名的方法，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其一，书名的主标题部分点明了研究的基本范畴，便于促进对于这一新兴学科的认识与了解，使之得以广布；其二，书名的副标题充分体现了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有提纲挈领、突出内容重点之妙；其三，随着学科的发展，对其他焦点问题可以有计划地进行更为深刻与广泛的探索与研讨，兼有系列研究、动态跟踪、连绵不断之长。以下首先切入正题，从语言学研究方法谈起，兼述编写原则，进而转入所从体例、章节内容安排的介绍，最后结于语言风格的提示。

语言学研究，不论理论背景、流派渊源如何，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都有必要向自然科学看齐。这是因为，行为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在许多情况下，首先必须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倘要回答世间万事万物实为何物的问题，似乎

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耐心细致的实证观察，二是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学研究中所采用的不同理论与方法，实质上可以归纳为研究者如何看待和理解个人内部世界与客观外部世界关系的具体表现。《功能·称谓·性别篇》和《文化·色彩·思维篇》这两部姊妹篇既然是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自然免不了反映出作者在从事具体研究工作中，对语言学的一些本质性问题所持有的基本观点与看法。这些看法与观点通过本书的撰写而表现出来之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研究理论或编写原则了。具体说来，在撰写《文化·色彩·思维篇》这部专著的过程中，尽可能在方法论上恪守以下五项原则。

- 1) 解码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decodability);
- 2) 可分析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analyzability);
- 3) 透彻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indepthness);
- 4) 重构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reconstructionality);
- 5) 概括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generality)。

既然这些原则理论体现了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并不拘泥于语言学研究本身，而是拥有广泛的外延特征，并见于其他问题的讨论，且不受时空因素、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制约。这是其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理论原则本身也必须具有系统性。推及上述五项原则，其相互之间也必须体现一种内在的联系，形成一种互为前提、环环相扣的依从关系 (a neste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cience)，分别体现出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结构性、规律性特征，以及知识论、方法论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先从语言的解码性谈起。所谓解码性原则，是基于物质本身具有的无限可分特性和人类与生俱有的观察实证本能这两个先决条件的。先来看看哲学研究和自然科学同这一原则的关联。

古希腊先哲德漠克利特 (Democritus, 公元前 460?—370) 可能是最早提出原子主义物质观的。他所谓宇宙万物都是由不可见的离子 (原子) 构成的猜想，使其获得了“原子主义” (atomism) 之父的美称，其学说对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大约 100 年之后，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子 (公元前 369—286) 用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说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此说，清末学者王先谦在其著作《庄子集解》(1987) 中有很好的解释：“捶，杖也。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其不可析，其一长存。故曰万世不竭。”这些是古代哲学家对于物质具有无限可分特性的论述。那么，对于人类与生俱有的观察与实证特质，他们又有什么看法呢？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 384—322) 曾经指出，“除了像在数学这类抽象的领域以外，对真实事物的直接观察是理解的基础” (Hunt 1999[1997]:28)。17

世纪以来,科学的启蒙,技术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使得整个西方世界在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原子解构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不同学科领域广为应用,逐步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合理存在这一事实分不开的。以下讨论,先从思想界说起,再谈自然科学,最后回归到语言学本身。这是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哲学、语言学、自然科学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巨壑,历史遗留给我们更多的,倒是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佳例与范式。

1689年,英国学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689])从经验主义出发,写成了《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开辟了知识论研究的新纪元。对于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语言、思维与知识的关系而言,洛克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首先,从辩证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语言既是传播知识的唯一手段,又是阻碍知识获得与增进的大敌之一(Harris & Taylor 1997[1989]: 128)。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复杂概念是由一系列简单的感觉和映像概念整合而成的。譬如说,“厚重性”、“金黄色”、“可熔性”、“延展性”、“固定性”这些简单概念的集合体,形成了我们对复杂概念“黄金”的理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验主义哲学更是风靡北美,主要人物有钱勒·皮尔斯(Chandler Pierce),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验主义哲学源于“苏格拉底法则”——世间万物和概念均有其“普遍界说”(universal definition)而形成各自独立的“形式”(form)。这一法则的目的在于通过归纳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寻求真理,解决问题的方法”,从知识内容上讲,使人类完成从“无知”到“有知”的过渡(季羨林 2000: 189)。1730年,现代物理学奠基人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通过三菱镜片,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与实验,成功地证明了白光不是单一的“白色之光”,分解开来,白光是由色光组成(Newton, 1730)。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生物学家——沃森与克里克,还是采用微观层面上的原子解构主义方法,联手合作,终于揭示出遗传代码DNA的双螺旋结构,为日后基因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的产生,毫无例外地说明,科学的发现往往“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季羨林 2000: 402),最终使人类有可能对世间万事万物究竟为何的问题做出回答,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的过渡。言及语言学研究,此理同然。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了历史巨著《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达尔文在书中提出的“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理念,对彼时盛行于欧洲各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语言学流派——达尔文语言学。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即

为其代表人物。基于进化论理论,施莱歇尔认为,语言同自然界万事万物一样,有各自特定的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这是语言学向生物学看齐的一个例证。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伦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933)不满于传统语文学(philology)的分析方法,倡导科学客观、忠实可信的语言学描写方法,提出“直接成分分析法”(IC Analysis),即为语言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又一明证。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语义学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随后又流行开来的“(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Hjelmslev 1953; Katz & Ford 1963),更为充分地体现了基于原子解构主义原则之上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所独具的魅力。虽然在分析抽象名词之时,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是我们对于自然语言总体认识的不足而造成的。其他语义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又何尝不是如此?综上所述,实证法与原子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语言学研究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在日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构主义:一种语言行为,只有当我们要对其发生动机、产生过程、具体表象能够像生命科学破解遗传基因密码一样,逐一解构之时,才有可能明白其义理机制,达到有针对性的重构目的。本书中有关色彩语码认知过程的讨论,通过观察我国大学生英汉色彩词语翻译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的讨论,反映出解码性原则所独具的理论阐释力。

语言学家常常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保证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充分实现可分析性原则的问题。所谓可分析性原则,是分别通过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以及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来体现。前者指的是,就人类目前的知识能力而言,我们对于某一个问题的分析是否具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和阐述能力;后者则认定,因为语言本身具有的物质性、结构性特征,所以对于研究者而言,其观察对象自然就有了可分析性。我们可以用一个直接便当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的可分析性特征。一个文本(a text)可以在篇章层面上划分为不同的段落成分;一个段落(a paragraph)又可以进一步分析为若干合乎语法规则、有一定意义的语字符串;一个语字符串(a string of words)还可以在句法层面上切分为类属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短语结构;一个短语结构(a phrasal structure)反过来又可以统辖若干字词;每一个字词(a word)在语音层面上复可以继续分析,层层解构成为音节、元音、辅音,乃至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细究起来,可分析性原则既同第一个原则有关,又同研究内容有关,还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兴趣爱好有关。这是因为,语言的物质属性,使其具备了可解码性特征;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又为可分析性原则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保障,但其应用程度的高低,却是因研究内容和研究者兴趣的不同而互异的。譬如说,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围虽广,研究内容亦杂,不易界定。但是从观察视野而言,计有宏观社会语

言学和微观社会语言学(macro sociolinguistics vs. micro sociolinguistics)之分。前一种研究从研究内容上讲,多与语言政策的制定(language planning)、语言接触的影响(language contact)、语言的演变与维持(language shift and maintenance)这样一些宏观层面的研究内容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同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言学的关系较为紧密。后一种研究往往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进行的,旨在考察言语行为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带有深刻的语言学研究烙印。《文化·色彩·思维篇》这部专著中所研讨的大部分内容,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因而从观察的适宜度来说,比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拥有更高的可分析性,属于解剖麻雀的那一类研究,虽然缺少气势上的恢宏和理论上的辉煌,但也无不反映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特征,不乏小中见大的妙趣与想象。

语言学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内容的透彻性。所谓透彻性原则,实际上也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指的是语言学家所必须恪守的一种学术传统与规范。具体而言,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务求资料占有的充分,理论框架建构的合理,分析手段使用的科学,以及分析过程的细致。另一方面,语言现象的物质属性使其同时具有可分析性特质,通过透彻合宜的分析手段,便能呈现出其“庐山真面目”——内在结构性。一个浅显的比喻即可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研究工作好比是纸上扎针,力求通透。倘若能够选准主攻方向,制定长远计划,一针一针扎下去,点连成线,线复成为片,长此以往,对于先前不解的问题,此刻有如洞若观火,由点到面,自然形成一个系统的看法。功力到此,义理明白,视野开阔,八方引证,写出的文章,自然力透纸背了。^①这便是季羨林先生(2000: 380)所谓“德国学术以其‘彻底性’(Gründlichkeit)蜚声世界”的缘故之一吧!社会语言学研究,疆域辽阔,包罗万象。经过40年的开垦耕耘,虽然还有许多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与其搜寻冷僻题材做表面文章,不如遵循透彻性原则,于细微平凡之处,见人之未能见,言人之未能言,既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方式(critical thinking)的优势,又突出了科学研究中原创性成果(research originality)的特色,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在语言文化、色彩语码,以及语言与思维各章节的讨论中,就透彻性原则,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与探索,但离上述要求,还很不够,今后尚需以此为目标,继续努力,不断求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杜伯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癌症研究的转折点:测序人类基因组”的纲领性文章,揭开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序幕(李虎军

^① 鲁迅先生曾言,选题要严,开掘要深。清华大学范红教授最近从英国学习归来,谈到牛津大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历来遵循着“one inch wide, one mile deep”的信条。中西文化、学术传统、研究背景、话语模式多有不同,不过在这一点上,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2000)。随着本项工程的完成,科学家有可能在充分利用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通过重构的方式,修复人类在遗传基因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为攻克癌症、肥胖病、心脏病、血友病等疑难病症铺平道路。语言学研究中的可重构性原则,从基本理念上而言,其功用与基因疗法大致相同。语言学研究中,通过解码性原则、可分析性原则以及透彻性原则的实施,有可能使得语言学家在了解语言内在规律的同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利用重构性原则,借助于新的科学技术,或镜像模拟心理语言结构,或重新构建自然语言系统。人工智能研究中的语音合成技术、机器翻译均是语言学重构原则的具体体现。除了在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这一原则还被广泛地应用在心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语言教学研究过程中——只有通过对语言学习者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分析解构,才有可能探究其语言使用的内在规律,从而在认知层面上对语码的重构性有一个新的认识,揭示“可教授性”(teachability)和“可学习性”(learnability)之间的关系,揭示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探索语言学习的机制,促进语言教学研究。本书中关于中国学生英汉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的研究,体现出这一原则的理论价值。

在所有5项原则中,概括性原则当属语言学研究中的琼楼玉阁、仙境胜地,是语言学家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故而常常令人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感叹。所谓概括性原则,是指通过重构性原则的实施,使语言研究者对于纷繁杂呈的语言现象在充分了解其内在规律、外部表征、个体差异、变异因素的基础上,在元认知层面上有一个概括性认识,从而在新的认识高度,通过全方位的观察角度,重新审视其形式功能及其相关因素。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外部整体论哲学观点(external holistic theories)之所以对彼时学术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就在于通过这种理论概括,能够把所观察到的事实在理性层面上形成一种整合概念,使人们对事物的本质有一个一般性的概括理解。我们采用社会语言学模式,对于英语复合成分-gate所构成新词的社会语义研究,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应用。不过,这方面的尝试,用力最勤的还数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一例。具体来说,本项研究采用实验调查方法,从社会语言学研究角度出发,结合外语学习环境,考察我国大学生英汉色彩语码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表现。这项研究是关于中国学生色彩编码能力的社会语言学系列调查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整个项目历时4年之久,一共包括7项实验内容,涉及三个调查群体、两种语言环境,受试总人数达160人次。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引入了5个人口因素和10余组语言水平参数,试图通过研究大学生色彩词语编码能力和上述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透析出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家庭背景、亚文化现象、学习动机,以及语言水准等多重因素对其母语和外语色彩词语的内在化过程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并对色彩词语使用过程中广泛存在的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给予更为充分的

解释(杨永林 2002a, 2002b)。限于篇幅,《文化·色彩·思维篇》中的讨论主要涉及我国大学生在英汉色彩语码翻译过程中的社会认知以及性别因素的研究。

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焦点问题,《文化·色彩·思维篇》一书试图结合个人学术兴趣与研究经验,对相关内容详加研讨。从体例上来说,本书是以章节形式划分的。各部分内容的选择,均以当前社会语言学研讨的热点问题为取舍标准;问题的讨论,多以作者独立完成的研究为主线,分别涉及来自英汉两种语言的实例。考虑到国内读者不易获得国外语言学研究资料,特别是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新资料,关于英语方面的内容,多以近年来作者在国外语言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主。这些学术刊物主要有:*Sociolinguistics* (《社会语言学》,美国/荷兰), *Language in Society* (《社会中的语言》,美国), *Word* (《词学》,美国),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语言学习》,英国),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英语语言学》,美国),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感觉与运动技能》,美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国际应用语言学》,英国/挪威),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Language Teaching* (《国际应用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评论》,挪威/德国), *Studia Anglica Posnaniensia* (《国际英语研究评论》,波兰), 以及 *Connecticut Review* (《康州评论》,美国)。

以上,是对本书编写原则的概括介绍;以下,介绍《文化·色彩·思维篇》中具体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文化·色彩·思维篇》一书共由四章组成,外加一篇作者前言。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研究的是两个普遍性问题,即: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怎样?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又是怎样?这两个问题的讨论都涉及到语言学研究中的“本能对教养”(nature vs. nurture)这一哲学命题,以及著名的语言文化决定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的合理性问题。前一个命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nominalism vs. realism);后一种假设的产生,也有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仍然属于一个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难解之谜。惟其如此,越是普遍性的问题,越是不容易谈出新意。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色彩词语文化含义以及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的研究;本书的第四章是《功能·称谓·性别篇》和《文化·色彩·思维篇》两部姊妹篇的结尾之作,试图采用宏观描述的手段,分别对社会语言学的性质和社会语言学的前景给予了概括性研讨。具体而言,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主要通过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来实现。第一章集中考察了社会语境中语言形式的流变。第二章主要讨论了近百年来色彩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变,揭示出基本色彩进化论观点与语言文化决定论观点之争是如何加深我们对语言思维与外部世界之间相关性的

理解的。此外，我们还提出了一种社会语言学色彩语码研究模式，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的影响。第三章是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通过语言哲学研究中普遍唯理论同文化规约论这两条研究主线，这一章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于语言与哲学、语言与逻辑、语言与知识、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心智，以及语言与文化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术语繁多，概念抽象，问题晦涩，可读性 (readability) 差，都是语言学著作所具有的一般通病。社会语言学的讨论在这些方面虽然聊胜于理论语言学的表述，少一些抽象与枯燥，但是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支，还是难于免俗，其间的差别，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文化·色彩·思维篇》一书在保证概念准确的前提下，论述部分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由浅入深；语言表述尽可能做到活泼明了，简洁直白。专业术语一般给出中英文两种形式；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一般也同时给出中英文两种对照形式，以方便读者。同时，针对每章中所讨论的重点问题，在参考书目部分，尽可能详尽地给出相关信息，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研究之用。出于同样的目的，参考书目采用博林杰和希尔茨(1981)的做法，按字母顺序排列，分章节列出，附于书末，便于读者有针对性地查阅，按图索骥，以求通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春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暇为本书写了序言。回顾我的学术发展过程，几乎是伴随着阅读、理解许多像桂先生一样知名学者的论著而一步步地走过来的。“饮水不忘掘井人”，感谢桂先生和语言学界的前辈对于后学的关怀和提携。最后，感谢高教出版社外语出版中心的刘援主任、贾巍老师、梁宇老师以及陈立民老师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杨永林

2003年秋天于清华园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社会文化，词语为镜：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使用关系研究 ...	1
1.1 研究背景	2
1.2 社会语言学与变化中的语言	3
1.2.1 语言流变中的潮汐现象	3
1.2.2 时代的发展与语言的变革	4
1.3 文化解读与文化误读	10
1.4 文化误读中的信息缺省现象	11
1.5 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研究传统	14
1.5.1 伦敦学派的传统	14
1.5.2 北美学派的影响	15
1.6 社会语言学的贡献	19
1.7 尤金·奈达的语言文化观	21
1.7.1 语言同文化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	22
1.7.2 语言不仅反映文化，同时也塑造文化	22
1.7.3 语义的多样性与语境的选择性	23
1.7.4 词语的意义取决于句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两个方面的因素	23
1.8 从“牛西红柿”事件，看文化差异现象	24
1.9 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在英语新词语中的表现	26
1.9.1 英语新词新语的来源	26
1.9.2 从饮食文化习惯，看词语比喻意义的扩展	28
1.9.3 从词语的功能转化，看语言同社会文化的关系	29
1.9.4 从专有名词的普通化现象，看文化概念在语言中的实现	31
1.9.5 从复合成分 -gate，看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对英语的影响	34
1.10 来自汉语研究的证明	41
1.10.1 来自汉语文化化学研究的证明	42
1.10.2 词语数量的增加	44
1.10.3 语义用法的扩展	45
1.10.4 结构文体的嬗变	55
1.11 来自英汉跨文化翻译的表现：文化误译现象枚举——语言的问题 还是文化的问题？	59
1.12 研究意义	62

第二章 七彩文化，尽现语言：色彩词语认知模式与社会文化因素

研究	64
2.1 色彩语码研究背景简介	65
2.2 丰富多彩的观察视野	66
2.2.1 哲学家的观点	66
2.2.2 人类学调查结果	67
2.2.3 民族学研究成果	68
2.2.4 神经生理学研究	69
2.2.5 遗传基因新发现	70
2.2.6 心理学实验报告	71
2.2.7 跨文化社会心理比较研究	72
2.2.8 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73
2.3 社会语言学色彩语码研究对于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74
2.3.1 研究背景	74
2.3.2 整合型色彩语码研究模式	75
2.3.3 实例分析	80
2.4 色彩词语的文化关联：来自中国大学生群体的实验报告	82
2.4.1 研究背景	83
2.4.2 实验设计	86
2.4.3 数据收集	87
2.4.4 实验结果	90
2.4.5 讨论与结论	93
2.5 研究意义	94

第三章 我言我思，泾渭难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3.1 研究背景	97
3.2 语言哲学中的普遍唯理论与文化规约论	98
3.3 语言与哲学	101
3.3.1 从名实之争到言无定论	101
3.3.2 希腊罗马先哲的看法	102
3.3.3 古代中国哲学的解释	106
3.3.4 从成语比喻，看名物之辩	107
3.3.5 从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现象，看名实关系	109
3.3.6 名实之争：语言问题，还是哲学问题？	110
3.3.7 现代语言学“言无定论”的理论基础	110

3.4	语言与逻辑	115
3.4.1	现实·逻辑·语法三位一体	115
3.4.2	何谓语法——规定主义的逻辑解释	117
3.4.3	认知语言学的解释	118
3.4.4	客观现实与语法系统的关系	121
3.5	语言与知识	123
3.5.1	语言工具与知识传授	125
	洛克的语言知识观	126
3.5.2	多维世界的感知与单维语言表述之间的矛盾	127
3.5.3	绝对动态的思维活动方式与相对静态的语言表达之间的冲突	127
3.5.4	语言工具性的困惑	129
	奥斯汀的“言有所为”理论	129
3.5.5	维果茨基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130
3.5.6	语法隐喻与修辞隐喻给予我们的启示	132
3.6	语言与心智	137
3.6.1	类典型理论的贡献	138
3.6.2	理论语言学的思考	139
3.7	语言相对论的解释	143
3.7.1	从洪堡特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144
3.7.2	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	145
3.7.3	卡普兰的篇章结构研究	146
3.7.4	范托拉的文摘结构比较	147
3.7.5	布鲁姆关于英汉条件句认知基础的研究	149
3.7.6	中国大学生色彩语码认知的调查	150
3.7.7	文化相对论与“认知”假设	151
3.8	研究意义	152
第四章	任重道远，贵在求索：社会语言学研究前景瞻望	154
4.1	一种全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155
4.1.1	鲜明的反传统精神	155
4.1.2	深刻的人文关怀倾向	156
4.1.3	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	156
4.1.4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	157
4.1.5	格物致用的学术传统	158
4.1.6	互补优势明显的边缘学科	159